

改革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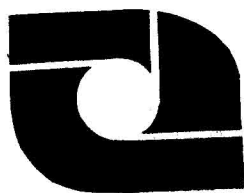
董启程
赵诚
陈晋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董启程 赵 诚 陈 晋



改革 春秋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

改 革 春 秋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

董启程 赵 诚 陈 晋 编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册

*

ISBN 7-203-00761-8

G·287

定价: 3.60元

606/2/32
04

前 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有关社会主义的历史。

社会主义，从它作为一种思潮出现，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已渡过了七十个春秋。

而我们这里，只不过是历史的长卷中截取了几个片段；在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寻到了几个足跡；在历史长镜头中摄取了几组不被人们所重视的镜头。

长期以来的封闭政策使我们对世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状了解不够，尤其是对战后四十年发生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轰轰烈烈的、有时简直是惊心动魄的改革运动，要么是知之甚少，要么是予以简单武断的评价，甚至轻易地斥之为“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对于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我们既缺乏全面的了解，更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正因如此，我们不少同志孤立地看待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革命，对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缺少深刻的理解，而对于别的国家在改革中已取得的经验或教训也不能很好地借鉴。

有鉴于此，笔者将四十年来苏联和东欧各国所进行的政

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资料，尽可能地汇集在一起。为了研究的方便，对其中一些国家革命前的有关历史事件也作了一些简单追忆，并且在反映历史真象的同时，作了一些必要的分析和评述。我们深知自己在这方面力不从心，只是想从中发掘一点历史的真谛，如此而已！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我们考察的对象——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现在正有加速度的势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本书的一些记述，也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相信各位读者是能理解这点的。

作 者

1988年6月

目 录

先驱者的足迹	
——南斯拉夫·····	(1)
一场历史悲剧之后	
——匈牙利·····	(27)
血影中的反思	
——人民波兰·····	(69)
“布拉格之春”的前前后后	
——捷克斯洛伐克·····	(96)
柏林墙，昨天、今天	
——民主德国·····	(133)
一滴水中看到的阳光	
——保加利亚·····	(157)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罗马尼亚·····	(176)
艰难的行程	
——苏联·····	(204)
历史给予人们的启示·····	(245)
后 记·····	(258)

先驱者的足迹

——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十六世纪出现的，它的开山鼻祖是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和文学家托马斯·莫尔。从那时起，经过三百多年，这一思想终于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完成这一伟大飞跃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诞生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其间只用了七十个年头。列宁是完成社会主义第二次飞跃的伟大先驱。遗憾的是列宁没有能够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最后建成就过早地逝世了。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这一伟大业绩。他不愧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创造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但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苏联中央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四十年代以后成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遵从而不得有丝毫越规的“雷池”禁地了。开始时，由于都是工业落后国家，又几乎都是在战争废墟上起步，这种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在实践中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奇迹。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种僵化模式的弊病就逐渐暴露出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要求各国人民突破这种僵化模式，走自己建设社会

主义的道路。然而，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这被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地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到达共产主义彼岸的路不会只是一条，光荣应当归于那些敢于探索新路的人们。以铁托同志为旗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实践者。还在五十年代初，他们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离经叛道，开始探索一条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这一行动招来了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一致讨伐，铁托则被指控为共产主义的十恶不赦的敌人。可是三十年之后，当南斯拉夫人民以辉煌的成就证明了自己的试验时，谁能否认当时的“叛逆”行为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呢？他们岂止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路径！他们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即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飞跃。

先行者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作为突破僵化模式的先驱，南斯拉夫人民同样也有自己的坎坷。

一、被迫走上一条新路

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民族。南斯拉夫正是这样。铁托说过：“历史学家已经记录了这个悲惨的事实：在我们国土上，五十代人中几乎没有一代不遭到战争的蹂躏和惨重的损失。”（《战斗报》1964.6.2）从十五世纪起，南斯拉夫各民族先后被土耳其、奥匈帝国所统治。面对外族侵略，南斯拉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与统一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14年

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就发生在后来的南斯拉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首府萨拉热窝市。这一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也没有能免遭劫难。1941年4月6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正当南斯拉夫首相的女儿举行盛大婚礼之时，德国法西斯匪徒向贝尔格莱德投下了成千上万的炸弹，顿时把整个城市淹没在浓烟与火海之中，死难者达两万余人。随即，德、意法西斯以23个师的兵力涌进这个巴尔干国家，使毫无防卫准备的南军迅速土崩瓦解。仅仅12天时间，即4月18日，南斯拉夫就被侵略军占领了。以铁托同志为总司令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就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成立的。在没有外援、物资匮乏、武器简陋的情况下，南共领导的游击队经过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5月15日解放了全国。同年11月29日正式宣告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胜利了。正如铁托同志说的：“我们不是在谈判桌上争得新南斯拉夫的，而是在战场上用我国人民每十人牺牲一个的代价争取到的。”

艰苦的斗争锻炼了英雄的人民，也造就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南共联盟以她自己的实践向人们证明：她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党，而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地指导人民进行革命运动的党；她的领袖是“有勇气用他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人。早在1937年，共产国际就曾作出过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这使南共一度陷入危机。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人顶住了这一“指示”，坚决地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党进行了整顿，使南共在国内赢得了威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共中央提出把民族解放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结合

进行的纲领，而共产国际却指示他们不要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提出社会制度问题。南共中央没有执行这一指示，坚持两个革命战争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坚持武装斗争，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了一个新南斯拉夫。从这些点滴事件中，我们看到南斯拉夫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斗争中早已形成了自己刚直不阿，无所顾忌的民族品格，这对于他们后来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促使南斯拉夫走上自治道路的原因却是复杂的。许多中外史学家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大体上不外三个方面。

首先是苏南冲突，这是逼迫南斯拉夫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的一条重要原因。

苏南矛盾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在酝酿，当时主要体现在南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联共党的领导通过共产国际干预南共事务，其中包括1937年作出解散南共的决议一事，南共对此有所不满。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南矛盾进一步激化了。1941年12月，当铁托元帅组建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并将其命名为“无产者旅”时，苏共领导极为恼火，并于1942年3月5日致电铁托：“为什么你一定要搞个什么无产者旅？”在对待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问题上，南共的态度一直很明朗，就是要抛弃流亡政府，建立新的人民政权。但共产国际却不同意。而苏联政府则一直与南斯拉夫流亡的彼得二世王国政府保持联系，并将流亡政府驻苏公使馆上升为大使馆。

战后初期，在关于的里亚斯特领土归属问题上南苏之间又出现了新分歧。

的里亚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

处，是多瑙河地区许多国家通向亚的里亚海的主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了南斯拉夫国家，其版图扩大到亚得里亚海岸。但到1918年意大利就出兵占领了的里亚斯特。在1945年4月解放南斯拉夫的最后战役中，南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和第四集团军解放了伊斯特拉，并攻入的里亚斯特，与这里的德军进行了整整三天的战斗，才收复了的里亚斯特。两天之后，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新西兰第二师开进了的里亚斯特。由于的里亚斯特的战略位置，英国早已觊觎这一地区了。5月初，南斯拉夫与英美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丘吉尔要以武力解决的里亚斯特问题。5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表示支持丘吉尔，并致电斯大林，“希望斯大林帮助他们对铁托元帅施加压力。”斯大林在复电中表明，铁托的部队留在那里是正确的，但又认为“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可以在那里建立管制，由亚力山大元帅（英军陆军元帅）同铁托元帅协商确定分界线。”（《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57页）于是在1945年6月9日，找到了妥协办法：将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和伊斯特拉地区分为A、B两区，A区（包括的里亚斯特、戈里察、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及伊斯特拉的西北部分）由盟军占领，而南边的普拉及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沿海其余部分划归南斯拉夫。（参看伊万·博日奇等著《南斯拉夫史》下册第770页、772页）南斯拉夫对英美苏三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的大国主义极为不满。铁托在1945年5月28日卢布尔的演说中指出：“据说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认识的。可是，我们也要谋求有一个合乎正义的结局，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家里的主人；我们不愿意为别人付出代价；我们不愿意充当大国谈判中的筹

码，我们不愿意卷入到任何争夺势力范围的政策中去。”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4〉第276页）

战后，苏南之间在保、南关系上，在南、阿（阿尔巴尼亚）关系上、在建立“巴尔干联邦”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的积累，终于在1948年引起了双方矛盾的白热化。

1948年2月，斯大林突然召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季米特洛夫去了，而铁托则派了卡德尔、巴卡里奇和吉拉斯去参加会晤。会晤中斯大林与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就南、保关系、巴尔干联盟问题批评了两国领导人，指出他们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你们正在执行一条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路线。”几天后，苏联单方面中断了正在莫斯科进行的苏南贸易协定谈判。3月18日苏国防部长布尔加宁通知南斯拉夫政府，召回所有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理由是“他们处于一种极不友好的气氛中，并受到敌视。”次日，苏联驻南大使馆又通知铁托同志。苏联政府将立即撤走一切文职专家。于是苏南间的矛盾冲突在两国之间完全公开化了。这以后，苏共在致南共的信中对南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指责。南共中央一方面耐心解释，另一方仍希望能相互取得谅解。在4月13日南共给苏共的复信中说：

“我们为迄今指引着我们而且仍旧指引我们前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永远感谢苏共，苏联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伟大的榜样，我们忠于苏联并高度评价它所给予我国人民的帮助。我们南共中央将永远对苏共忠诚，为了纯洁这种同志式的、兄弟般的情谊，我们唯一的愿望是消除一切猜疑和不信任。”他们同时提出请苏共派一个代表团来南进行调查

研究，以解决双方分歧。苏共拒绝了这一邀请，而坚持把分歧提交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解决。终于在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南共的行为，已使它自己“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因而也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决议列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罪状”，指责他们的政策是“左倾的”、“冒险的”、“笼络人心”和“无法实现的”。号召南共党员中“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健全分子”迫使领导改正错误，如果他们拒不悔改，就“撤换他们，并选出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领导机构。……南共存在与发展的利害关系，要求结束这个政权。”（《共产党情报局文件集》莫斯科中文版第40—41页）

6月28日，这一天简直是不可思议！这一天是南斯拉夫的宪法节，可在南斯拉夫的历史上这一天发生过多少重大事件啊！1389年的6月28日，发生了科索沃画眉坪之战，从此，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对南斯拉夫五个世纪的统治；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被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4年之后，又是在这一天，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历史竟是这样的奇怪！

一个月之后，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铁托作了长篇报告。他指出，情报局决议“不仅是对我们党的领导的攻击。这是对我们党的团结的攻击，是对我国各族人民鲜血凝成的团结的攻击，这是在号召一切破坏分子起来摧毁我们目前为了造福我国各族人民已经建设的一切，这是在号召挑起国内战争，这是在号召消灭我们的国家。”（《铁托言论集》

1942—1948年，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4—195页）但尽管如此，南共仍旧希望妥善解决矛盾，尽快改善苏南关系。铁托在报告中说：“希望苏共的领导同志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亲自给他们看看，情报局的决议有哪些地方说不符合实际。”表示一旦南苏两党的争论得到解决，南共将重新加入情报局。他还强调说：“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将竭尽全力使我们党和苏共党的关系重新得到改善。”（《铁托言论选》1942—1948年第203页）

然而，愿望与现实恰恰相反。南斯拉夫党和人民得到的是更加严厉的制裁与难以承受的压力。政治上，南共被指责为“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在情报局次年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决议，谴责南共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英美帝国主义的“佣仆”，法西斯的“政治匪帮”，贝尔格莱德是反苏宣传的“中心”，“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是英美的“间谍”，已成为人民公敌。这个决议当时得到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支持，各国党纷纷谴责南共。南在东欧各国的近150名外交官被驱逐出东欧各国。在东欧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开始了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清洗运动。阿尔巴尼亚党中央组织书记、国家内政部长科奇·佐治被控“铁托分子”而处死；匈牙利内政部长拉伊克被控“铁托的帮凶”而处死；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因被控“与铁托集团有密切联系”被处死；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被控为“托洛茨基——铁托分子”被处死；波共总书记哥穆尔卡也因是“铁托分子”而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坐牢三年……。这就使南斯拉夫

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陷入孤立境地。经济上，1949年初，几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都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断与南的一切贸易关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的贸易就占到南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南斯拉夫五年计划中投资的95%是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这一中断给南经济造成极大困难，仅1949年一年时间就使南斯拉夫外贸赤字由原来的24亿第纳尔上升为627亿第纳尔。这种经济封锁不仅造成五年计划不能完成，而且使南斯拉夫人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随之而来的军事压力也愈来愈大。从1949年开始，整师整师的苏联坦克部队开进与南接壤的东欧国家，在南匈边界、南保边界和南阿边界上不断发生边界冲突，以至迫使南斯拉夫军队一度时间不得不进入警戒状态，以防万一。

总之，由于南苏关系的破裂，使南斯拉夫面临一场最严重的考验。严峻的现实迫使南共领导人重新审查自己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也不得不同样严厉地审查苏联的全部理论与实践。他们必须搞清楚：到底是谁错了？错在哪里？后来南共领导同志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尽管困难很大，问题堆积如山，但他们都一头扎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去。仔细阅读、研究，并开始了批判性的思考。这是他们能够首先突破苏联僵化模式的一条重要原因。

其次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人口2200万。二战之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7%，产业工人只占2%，农业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一半。1939年国民收入平均每人只有112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南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损失40%，农业损失

25%，大战结束时，全国生产力仅为1939年的1/3。50%以上的铁路和70%的机车都破坏了。建国之后，南斯拉夫立即着手恢复经济。到1946年底90%的铁路就已恢复使用。到1947年工农业生产量就已达或略微超出了战前1939年的生产水平，其经济恢复的速度创造了世界纪录。1947年4月，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正式公布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当然是以苏联为蓝本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工业是其中心，而钢铁、电力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则是苏联那种中央集权型的。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这种僵化模式的弱点就开始暴露了，企业缺乏活力，劳动者积极性受到挫伤，随着国家机关权力增大，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的现象也不断出现。加之苏联、东欧国家对南的经济封锁，1950年又发生严重旱灾、农业减产近半。这一切把南斯拉夫经济逼上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这种状况，迫使南斯拉夫不得不首先从经济体制上进行改革。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南斯拉夫是一个有三十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其中主要民族五个：塞尔维亚族（840万）、克罗地亚族（480万）、斯洛文尼亚族（170万）、马其顿族（120万）和黑山族（又译为门的内哥罗，60万），另外有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等。但在这三十多个民族中没有哪个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各民族由于本身历史发展的原因，都有比较鲜明的民族特征，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南斯拉夫国内通行两种书面文字，即拉丁文和西里尔文。通行三种语言，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

其顿语。有四种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北部地区比较发达，而南部马其顿、黑山、科索沃比较落后。这样自然就产生了复杂的民族问题。南斯拉夫一位政治学教授沃·斯塔诺夫契奇说：“南斯拉夫是个小国，南斯拉夫的特点是在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而且根深蒂固，这是互不信任、看法不一和利益不同的根源。在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也差别很大。无疑，我们也有自己的北方和南方，还有东方和西方，这些差别是‘坏的’还是‘好的’，这就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差别中寻找一致，在保持所有特点的同时发展那些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因素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

（1985年1月13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这种特殊的国情对于南斯拉夫选择一条自治社会主义道路恐怕是不无关系的。

就这样，南斯拉夫“踏上了一条冒险探索、发扬批判性思考、实现制度革新的令人惊异的历程。”专门从事南斯拉夫研究的美国学者丹尼森·拉西诺在他的专著《南斯拉夫的实验》一书中这样形容：“此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批判、理论和实验之花突然之间竞相开放，尽管起初往往是些思想上幼稚和政治上天真的东西，但是显得信心越来越强，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判断才能。……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设计的体制反映出一种不断变动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宛如鸡和蛋的关系一样，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断定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段话多少反映了一些当时的情况。确实，南斯拉夫就是这样开始脱离苏联模式的轨道，走上改革之路的。